

70

袁 宾 徐时仪 史佩信 陈年高 编著

113.0f.3
Y8 1
1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二十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
·上册·

巴蜀出版社

总序

20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在这100年中，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增长，科学的进步，艺术的繁荣，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

语言学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科。在20世纪，它一改其往昔慢悠悠的步履，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跨起大步。特别在后半个世纪，其变革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中国的语言学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研究是为注释经典和语文教育服务的，属于语文学的范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语文学开始吸取西方语言学中先进的东西。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过程中，《马氏文通》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马氏文通》是迎着20世纪的曙光应运而生的。它给传统语文学画了一个句号，使中国语言学开始从语文学中独立出来，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篇章。

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中国语言学在各个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有些分科的研究，已引起了世界语言学界的注目，显示了中国的现代语言学逐渐走向成熟。

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它得力于本世纪中多次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五四时期，“科学”、“民主”的呼声，促进了中国的学者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的巨大积极性，使得一些对我有用的国外先进理论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的语言学理论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此而削弱甚至拒绝了对其他先进语言理论的学习和吸取，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到了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融化了“文化大革命”覆盖在学术土壤上的冰层，吹绿了一片片学术园地，在语言学这块苗圃上，也开始绽放出一朵朵鲜艳的花蕾；经过十余年的耕耘，这块土地上的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其次是得力于外国先进语言学理论与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中国语言学的每一次进展，几乎都与吸取外国先进理论有密切关系。当然，中国语言学又很注意自己固有的理论传统，学者们也比较注意中国语言的特点，力求做到外国理论与中国语言实际相结合，与本土经验相结合。第三，是学者们可贵的敬业精神。应当看到，从世纪初寥若晨星的研究人员（其中不少并非专职研究语言学）发展到现在数以千计的专业研究人员，这个变化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真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由于一批又一批为语言学事业献身的“拓荒者”的坚韧不拔、安贫乐道的敬业精

神，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后来居上者。

同国外语言学(特别是西方语言学)相比较，中国语言学的人文性十分浓厚，而西方语言学则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较深。中国语言学的人文性有一定的长处，这当然与中国悠久的人文传统有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中国语言学在文化意蕴、研究方式以及语言政策的制订等方面都带有自身的特点。人文性成为中国语言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特性。当然，由于与自然科学的联系相对脱节，也就不可避免地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了某种制约作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自然科学的含量较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我们有了自己的语言学。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可喜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虽然还有不少困难，但势头越来越好。本丛书中每一册都真实而科学地记载着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轨迹。不仅总结这100年来的辉煌成就，而且还要找出问题，找出不足，展望下一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走向。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做得好，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及子孙，是功德无量的。当然，我们在总结这100年的语言学进展时，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析，要反对党同伐异和门户之见，要提倡在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对各学派一视同仁，促进中国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担任本丛书学术顾问和参加本丛书撰写的，都是这些领域中的知名学者。由于这套丛书毕竟是个人的著作，这就决定了这些书只能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书中表述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在学术上不能强求一致，应当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以利百家争鸣；其正确与否，既要听取专家、读者的意见，还要接受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验证。

[4] 二十世纪的汉语词汇学

我们诚挚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订,使其日臻完善。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编纂出版委员会

1996年9月

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学术顾问指导委员会

首席顾问：吕叔湘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良 王 均 邢公畹 张 斌
张志公 季羨林 周有光 胡裕树
俞 敏

编纂出版委员会

主 任：张成德 张凤瑞

执行主任：宋富盛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根元 王 宁 王希杰 王梦辉
石 锋 邢福义 刘 坚 刘叔新
许宝华 许威汉 孙宏开 张凤瑞
张成德 宋富盛 严 修 苏培成
杜厚勤 李行健 李晋荃 陈庆延
陈章太 杭海路 周 荐 赵 诚
胡明扬 费锦昌 袁 晖 袁 宾
曹先擢 梁申威 温端政 詹伯慧
潘 慎 戴庆厦

总策 划：袁 晖 杭海路

策划人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梦辉 刘德斌 杭海路 袁 晖
梁申威

目 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	(3)
第二章 近代汉语的研究价值	(10)
第三章 近代汉语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15)

第二编 语音研究

第一章 20世纪前近代汉语语音研究述略	(25)
第二章 语音史的研究(上):历代音系	(37)
第一节 晚唐五代语音	(38)
第二节 宋代语音	(48)
第三节 元代语音	(57)

第四节 明代语音	(75)
第五节 清代语音	(83)
第三章 语音史的研究(下):声韵调的发展	(91)
第一节 声母系统的发展	(92)
第二节 韵母系统的发展	(101)
第三节 声调系统的发展	(113)
第四章 近代汉语共同语和方言的研究	(122)
第一节 近代汉语共同语及北京话的形成	(122)
第二节 近代汉语方言	(135)
第五章 北音学的研究	(168)
第一节 北音学概述	(168)
第二节 北音韵书的研究	(188)
第六章 等韵学的研究	(205)
第一节 等韵源流	(205)
第二节 等韵图	(219)
第三节 关于几本等韵学著作的介绍	(232)
第七章 语音文献整理和语音研究方法	(238)
第一节 语音文献的整理	(238)
第二节 语音研究的方法	(261)

第三编 语法研究

第一章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	(277)
第一节 20世纪以前研究概况	(277)

第二节	20世纪研究概况	(281)
第二章	指代词	(296)
第一节	人称代词	(296)
第二节	指示代词	(312)
第三节	疑问代词	(316)
第四节	词语演变的几个模式	(328)
第三章	助词	(332)
第一节	动态助词	(332)
第二节	结构助词	(384)
第三节	事态助词	(412)
第四节	语气助词	(426)
第五节	其他助词	(447)
第四章	处置式	(458)
第五章	被动式	(485)
第一节	被字句	(485)
第二节	其他被动式	(497)
第六章	动补结构	(508)
第一节	动结式	(508)
第二节	动趋式	(523)
第三节	带“得”字的动补结构	(536)
第七章	疑问句	(545)
第一节	“是(还是)”字句	(545)
第二节	“可”字句	(556)
第八章	比字句	(562)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

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

近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历史学科。研究这门学科理应确定或大致确定其历史范围，也就是说，应该弄清楚近代汉语的上下年限。这个问题在 80 年代以前未见专门讨论，有些学者在对整个汉语史分期时曾涉及此问题，如 20 世纪早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① 第一卷第一章中说：

我们可以说这个反切（指《广韵》的反切，引者注）是纪元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间的一个语言。这个语言我们可以叫做中古汉语。这个时期以前的叫做上古汉语跟太古汉语。以后的叫做近古汉语——就是韵表的音；再往后就叫作老官话——就是《洪武正韵》的音。

稍后钱玄同《文字学音篇》(1918)把汉语语音的演变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等 6 个时期。

以上是 20 世纪早期关于汉语史分期的两种观点，都是从研究汉语语音史的角度提出来的。

王力在 50 年代中期完成的《汉语史稿》第一章第六节《汉语史的分期》中提出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

^① 该书共分四卷，陆续出版于 1915 年（第一卷）、1921 年（第二、三卷）、1926 年（第四卷）。此处引文据罗常培等译本，1940 年。

代 4 个阶段的意见：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期）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王力是从语音、语法、词汇 3 个方面综合考察，并“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结合语音的演变），来给汉语史分期的。他同时指出 4 个发展阶段各自的语言特点：

上古时期的特点是：1. 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2. 在疑问句里，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面；3. 入声有两类（其中一类到后代变了去声），等等。

中古时期的特点是：1. 在口语的判断句中系词成为必需的句子成分；2. 处置式的产生；3. 完整的“被”字式被动句的普遍应用；4. 形尾“了”、“着”的产生；5. 去声字的产生，等等。

近代汉语的特点是：1. 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2. -m 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3. 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等等。

现代汉语的特点是：1. 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2. 大量地增加复音词，等等。

对此 4 个阶段汉语的各自特点的概括，实际上是王力对汉语史分期的依据。王力的分期说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在每两期之间安排了一二百年的过渡阶段。因为他认为语言的发展是渐进的，由语言旧质到新质的过渡阶段可以历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

王力对于汉语史分期的意见和论证方法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海内外汉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一些学者接受或基本接受（如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1982；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1988）。

80 年代，吕叔湘结合近代汉语上下限问题，陆续地提出了他对汉语史分期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汉语史分期在第一层面上应该是二分的：

有同样重要的一点也必须闹清楚的是，尽管我们说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我们却不认为把汉语史这样平分为三段是适当的。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

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近代汉语指代词·自序》，1984）

关于近代汉语时段的起讫，吕叔湘认为：

我们发现，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

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近代汉语读本·序》，1983）

这样，汉语的言文分歧（即实际口语和文献语言的分歧，引者注）就维持了很长一个时期，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重新统一起来。所以把五四时期定为现代汉语开始的时期是合理的。（同上）

吕叔湘对于汉语史的分期主要是从文献语言反映实际口语的情况来着眼的。1986年，吕叔湘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一书写的序中提出新的想法，他说：长时期的言文分离，给汉语史的分期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是不是可以设想，把汉语史分成三个部分：语音史、文言史、白话史，这样也许比较容易论述。文言由盛而衰，白话由微而显，二者在时间上有重叠，但是起讫不相同，分期自然也不能一致。

吕叔湘此种新想法似乎表明了他对以前的诸种汉语史分期的意见（他人的以及他本人的）并不尽满意。此种想法为分期问题，包括近代汉语时段起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吕叔湘的上述重要意见，也许是因为并非专文讨论，而是发表在几种书稿的序言之中，所以未见更多的具体论证。他关于近代汉语起于晚唐五代、止于五四运动的提法，与许多学者在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于近代汉语的认识比较吻合。

80年代后半期，关于近代汉语的上下限的问题曾一度受到关注。1986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与会学者曾就此问题进行商讨，胡明扬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专题论文《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后收入

会议论文集《近代汉语研究》，1992），他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红楼梦》对话部分反映的口语应该是现代汉语。他提出的分期依据是：

1. 语音上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 -p、-t、-k 从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m 韵尾的消失。
2. 语法上“的”、“了”、“哩/呢”的出现和全面代替旧的助词系统；“这、那”代替“此、彼”；“将/把”字句的出现和发展；“动+将+趋”的出现、发展和消失。
3. 语汇中“我、你、他”（还有“们”）的出现和全面代替“吾、汝、其”等古汉语人称代词。

杨耐思、袁宾的意见，会后也写成专文发表。杨耐思认为，语音、词汇和语法三者发展不平衡，所以近代汉语的上限与下限不能“一刀切”。他同意吕叔湘的意见，近代汉语大致上是“晚唐五代到清代的一千余年”。（《加强近代汉语研究》，1987）袁宾认为，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暂不宜采用划线切分规定上下限的方法。他认为，汉语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和交替重叠部分组成，以南宋、元、明、清初为近代汉语主干，上下可推延几个世纪。（《论近代汉语》，1987）

稍后，蒋冀骋在他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1991）中说：“本书上限采用吕叔湘先生晚唐五代说”，“近代汉语的下限本书以明末清初为界”。

杨建国《近代汉语引论》（1993）认为：“我们主张暂时将有唐一代整个包括在近代汉语之中。”

蒋绍愚在他的《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中认为：“近

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

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1992)指出：

目前对近代汉语历史年代划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但是大部分近代汉语研究工作者倾向于接受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前后，下限定在清代前后的意见。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对近代汉语的描写将会更加细致和充分，分期问题也将得到明确的答案。

这次关于近代汉语上下年限问题比较集中的讨论，前后历时 10 年左右，是 20 世纪内在整个近代汉语学科层面上的一次重要的专题学术争鸣。各家的论说提供了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方法，在他们的论著中，还列举了大量有证史价值、不可忽视的文献语言材料，共同形成了此课题研究的有益成果。这次由多位学者参与的讨论对于近代汉语学科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它使大家从理论上对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有了大致接近的看法，有利于此后的研究、教学和文献整理等工作，也便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更多的人正确认识和总体把握近代汉语。

在大体上弄清楚了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之后，还有个语体范围的问题需要附带说一说。唐代至清代的大量文献，既有用口语写作的，也有用文言写作的，当然也有混用两种语体的。它们是否都能代表近代汉语呢？蒋绍愚在《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 中曾给近代汉语下过如下定义：“近代汉语是从唐初到清初人们在口语和反映口语的书面语中使用的汉语。”（着